

读《史记·李将军列传》兼谈 两汉“莫府”图像和模型

杨 泓

内容提要 李广是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名将，后在大将军的莫府引刀自刭。莫府又称“幕府”，是前线将领的办公场所。关于其建筑布局，前人鲜有讨论。本文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展开，通过考证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的壁画，复原了护乌桓校尉莫府的全貌。2007年，山东临淄山王村西汉墓从葬坑发现一组车马军阵的陶俑群，这组建筑模型与和林格尔东汉壁画所表现的莫府大致相同。作者认为，这是一座西汉时期的莫府模型，它为后人了解当时的莫府建筑提供了珍贵资料。

关键词 李广 莫府 汉墓 壁画 模型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唐·王昌龄《出塞》）

诗中的“飞将”即“飞将军”，用典出自太史公司马迁所著《史记》的《李将军列传》，李将军为西汉名将李广。“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1〕}

一

李广是陇西成纪人，为秦将李信后裔。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他“以良家子从军击胡”，开启了其军旅生涯，当时他只有十余岁。李广“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汉景帝时，先从太尉周亚夫击吴楚军，后任上谷太守，徙上郡太守，接着先后转任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地，一直任边郡太守，抵御匈奴，“皆以力战为名”。汉武帝继位后，“左右以为广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但李广并非在每次参与对匈奴作战时都能取胜。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在马邑伏兵诱匈奴单于时，李广为骁骑将军，领属护军将军。“是时单于觉之，走，汉军皆无功。”更大的失败是在元光六年

〔1〕 《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页2871，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下文中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李将军列传》。

(前129年)，“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虽然李广在被俘后逃回，“汉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李广居家数岁后，“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就是在右北平时，匈奴畏惧李广，称他为“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右北平太守任后，汉召广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前123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过了两年，元狩二年(前121年)，“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结果广军与匈奴左贤王所率四万骑兵相遇，以寡敌众，力战两天，张骞军终于赶到，匈奴军才解去。“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

李广征战多年，一直“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与他从弟李蔡相比，“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元朔五年(前124年)李蔡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右贤王，有功而封为乐安侯，后又代公孙弘为丞相。而且“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李广却始终“无功”而未得封侯。李广心有不甘，元狩四年(前119年)他已年过六十，仍力请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原本期望这次可以满足他建功封侯的夙愿，但天违人愿，因所领军失道迷路，未能及时与大军会合，当被大将军簿责后，他愤而自杀。为汉廷征战长达47年的一代将星，殒命疆场。李广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此后，西北边郡人民一直怀念这位保边拒敌的“飞将军”，直至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壁画中还绘有他的画像。

李广长得什么模样？他生时没有留下画像。《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只简单地记述了他的体貌特征：“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而且“广讷口少言”。据此记述很难画出他的形象。西晋距李广生活的年代又过了三四个世纪，但是因为西北边郡的民众一直怀念他，就按他们心目中善射的骑士的形貌为他画像。1992年，甘肃敦煌佛爷庙湾西晋墓出土了一方砖画^①，画面上有一位骑在马上、返身张弓射箭的骑士，骑士右方墨书榜题“李广”二字[图一]。这就是人们仍在追忆的“汉飞将军”李广，它也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李广画像。

《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失期自刭的描述，十分生动具体，照录于下：(元狩四年春)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注：赵食其)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故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

① 《中国文物精华》编辑委员会：《中国文物精华·1997》图版119，文物出版社，1997年。

〔图一〕甘肃敦煌晋墓“李广”铭砖画
采自《中国文物精华·1997》图版119



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

二

在《史记·李将军列传》对李广失期自刭的叙述中，“莫府”或“幕府”一词凡三见。“莫”、“幕”同，即帐幕，将军行军，宿于帐幕，其办公场所也在帐幕之内，故称“莫府”或“幕府”。《汉书·李广苏建传》唐颜师古注，对莫府解释甚明：“莫府者，以军幕为义，古字通单用耳。军旅无常居止，故以帐幕言之。廉颇、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则非因卫青始有其号。”^{〔1〕}这说明“莫府”之名源自先秦^{〔2〕}。元狩四年（前119年）征匈奴时，大将军、前将军自然都设有莫府，也都设在驻地帐幕之中。西汉时行军使用的帐幕及营地布防情况，目前还缺乏考古学图像标本。现在已发现的汉魏宿营画像中，只是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内有小幅画面。1972年清理的嘉峪关第三号墓内，在前室前壁墓门两侧上方分画两幅壁画，右为宿营画面，

〔1〕 《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页2442，中华书局，1962年。

〔2〕 据《史记》记载：“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页2447，中华书局，1959年。

左为统军出行画面^{〔1〕}。宿营画面中央绘一大型帐幕，其两侧和前后整齐地排列着许多小型帐幕，在各小帐前地面上都竖立有戟和楯。居中的大帐中，领兵的将领端坐在正对帐门的榻上，手执便面。帐外左右两侧各侍立一军吏〔图二〕。这处营地规模不大，那些小帐似乎每帐只供一个士兵住宿，因为帐前只竖有一枝戟和一面楯。将长柄的格斗兵器戟和体量较大的楯竖在帐外，只将短刀、剑和铠甲带入帐内，是汉晋时宿营的一般习惯。晋将祖逖宿营时，曾遭樊雅夜袭，“祖逖军大饥，进据食大丘城。樊雅遣六十余人入逖营，拔戟楯大呼向逖，逖军夜不知贼多少，皆欲散走”^{〔2〕}。正是因为军中宿营时士兵皆将戟、楯竖于帐前，夜袭者才可随手拔戟、楯大呼。可见当时宿营一如嘉峪关壁画所示，仍沿袭汉魏习惯。嘉峪关壁画所绘，仅是一位领有数十士兵的低级将领的营帐，但小中见大，可以由此推想更大规模的军队宿营

〔图二〕甘肃嘉峪关魏晋墓营帐壁画

采自《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图版八六:1



〔图三〕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宁城图”壁画局部

采自《中国出土壁画全集·9》图版62



〔1〕 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

〔2〕 《太平御览》卷三五二引王隐《晋书》，页1670，中华书局，1963年。《晋书》卷六二《祖逖传》所记文字略有不同：“军中大饥。进据太丘。樊雅遣众夜袭逖，遂入垒，拔戟大呼，直趋逖幕，军士大乱。”页1695，中华书局，1974年。

的营地，想到那“夜深千帐灯”的大军宿营情景。从魏晋时营帐的形貌，可以反推所沿袭的汉时军营帐形貌。

行军时将军办公皆在幕帐中，称“莫府”即“幕府”，所以当军队回驻都邑城市时，将军的办公地点也习惯称为“莫府”。由于带有浓烈的军事色彩，故莫府与民职官员办公的衙署有明显的区别。

关于两汉时期“莫府”的形象资料，最早的考古发现是1962年发掘的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1〕}，墓内所绘壁画中，描绘墓主生前官宦历程的题材占据了大部分壁面，又因为其最后所任官位最高的是护乌桓校尉，《续汉书·百官志》：“护乌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乌桓胡。”应劭《汉官》：“拥节。长史一人，司马二人，皆六百石，并领鲜卑。客赐质子，岁时胡市焉。”^{〔2〕}所以护乌桓校尉莫府的图像是该墓壁画的重点。

该墓不但有描绘护乌桓校尉所在的宁城图像，还有莫府东门等莫府建筑的局部图像。在前室中层左方一直沿续东、北、西三壁画，有护乌桓校尉出行画面。中室东壁下半部绘有一幅“宁城图”，城中绘出了护乌桓校尉莫府的图像〔图三、图四〕。此外，在墓门甬道的两壁上，画有“墓府门”；前室东壁转角处画面，榜题“幕府东门”〔图五〕；在前室南壁，绘有榜题“功曹”等的府舍。这些都可以补充因宁城图的画幅有限而没有绘出的一些具体建筑。如果将这些内容补充到宁城护乌桓莫府图中，就能基本弄清护乌桓校尉莫府的全貌。

在和林格尔东汉墓的宁城护乌桓莫府图中，入城门向内，到达莫府南门。画师在绘画时随意按他的需要而改变不同建筑的视角和透视〔图六〕。先是宁城的四面城墙按平面图画成方形，又将宁城南门画成正投影的侧立面图。进入城内，又把莫府门画成带透视角度的立体图像，于是本来正对着的两座门变成一侧面一斜面，很不协调。画师想把本应坐北朝南的正厅绘在画面的正面，因此在进入宁城南门后，他将本应正对城门的莫府门改绘成侧斜状，入内后，前院也呈侧斜状。从前院进入正院后，画面再度扭曲，将南北向的正厅扭成正对画面前方的正面像。如此随意变化，自然是为了突出坐于厅内的主人，让其正对画面前方，以凸显他在莫府中的权势。但是如此随意改变透视方位，把原本方正的中国传统厅堂庭院格局绘得歪斜奇特，不仔细分析，难知其庐山原貌。当我们认真考察后，可以得到较为完整的东汉晚期护乌桓校尉莫府的平面图〔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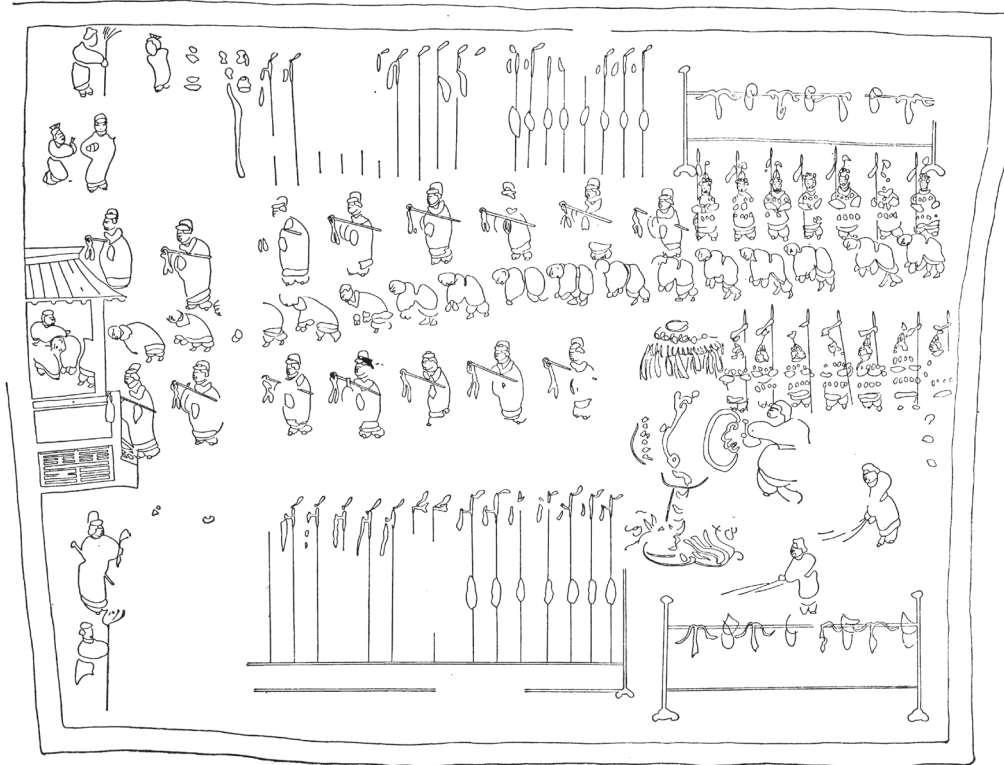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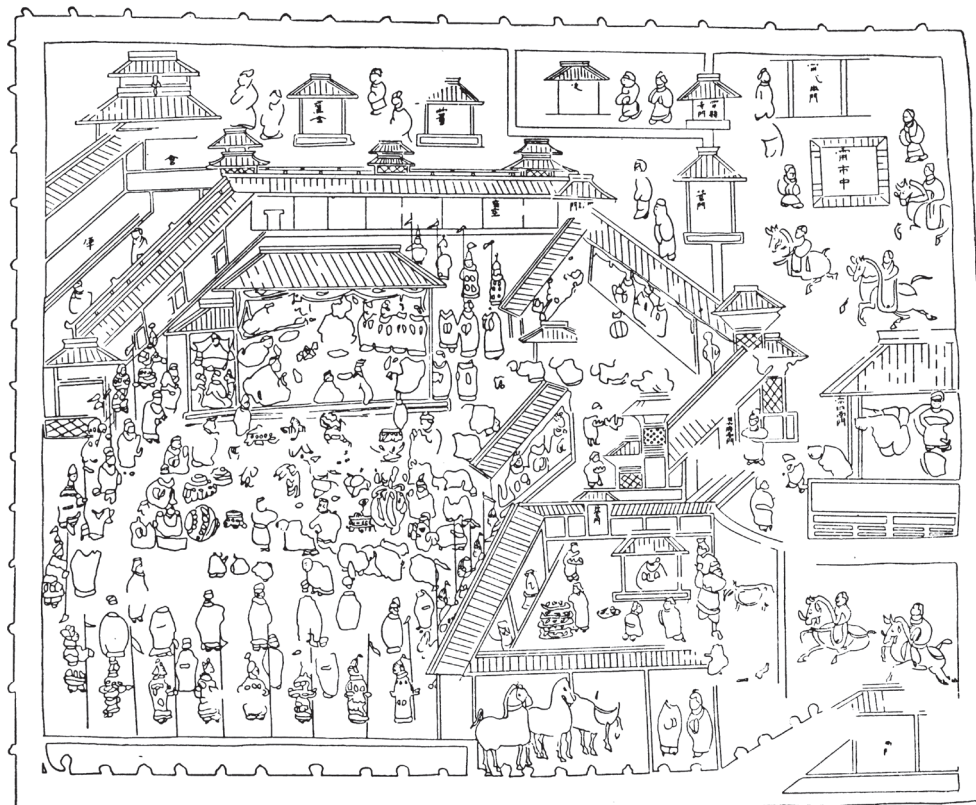
简言之，护乌桓校尉莫府是一座有三进院落的建筑，整体平面呈长方形，坐落在宁城内居中处，占据了城内的大部分面积。概括说来，莫府与宁城在画面上已经结合为一个整体。莫府前陈设兵器的兵兰，就排列在宁城的城门之外道路两侧，插置的兵器分别是矛和戟。兵兰之间当道竖立建鼓。在壁画中，前来谒见的乌桓等族人士，列队匍匐拜于城门前。宁城南门（正门）正对着莫府南门（正门）。

由壁画图像可知，莫府门两侧立双阙，门扇分饰青龙、白虎图像，并设有建鼓。在莫府门西侧建有一个平面近方形的院落，这组建筑包括马厩和庖厨，东墙有门通向前院，马厩西侧也可直接出到大街。

〔1〕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

〔2〕 《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志》，页3626，中华书局，1965年。

〔图四〕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宁城图”线描图
采自《和林格尔汉墓壁画》页17,图34、35



〔图五〕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莫府东门壁画
采自《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图48



入莫府门后，是一个平面呈横长方形的前院，北墙居中开门，通往正院。正院平面大致呈方形，正院两侧和后壁建廊房，后壁廊房有“齐室”，在廊房上方左、中、右侧，各建有一座望楼。

正院的主体建筑是坐落在北侧居中、宽敞的莫府正厅，是护乌桓校尉办公及宴会的场所。正厅右旁的侧厅，供女眷起居。画面中主人坐在正厅正中，宴请宾客。院子里四周侍立着全装甲冑的卫士，院中满是来谒见的人士。正院后面是一个较窄的横长方形后院（在画面上绘出的后院，似是在正厅右侧，系因画师为使正厅面对画面前方而改变了视角形成的，实为后面）。沿后壁建一排房舍，榜题“库”，应是储藏兵器装具等的库房。其最东角是一座两层的仓楼，榜题“仓”，所

绘形貌与东汉墓经常出土的两层的陶粮仓模型近同。

在莫府正院左侧（即东侧），与其平行建有营房，营房正门比莫府北门稍退入一些，榜题“营门”。营房是一座宽大的平面呈长方形的院落，莫府以下各属吏办公的场所，应都设在其中。在宁城图上只绘出两处，榜题为“营曹”和“司马舍”。但是在该墓另几幅描绘莫府局部的莫府东门等壁画上，绘有“右贼曹”、“左贼曹”等办公场所和榜题“功曹”的办公场所，内分设“右仓曹”、“左仓曹”以及“金曹”、“阁曹”、“寨曹”等。这些局部绘出的曹属办公场所，恐均应集中于莫府东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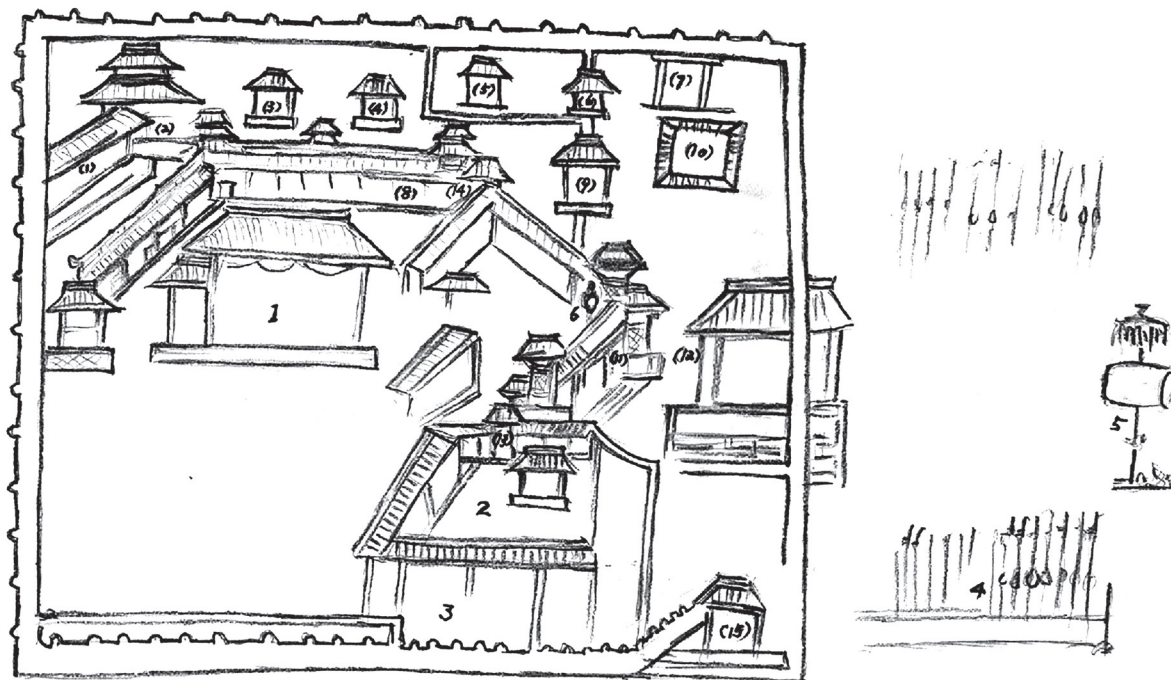
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护乌桓校尉莫府图像的发现，让今人得以了解东汉时莫府的具体形象，它是否承袭西汉时将军莫府的传统，还无法阐明。要解开这个谜，还需要等待有关考古新发现，这一等就是几十年。

2007年，山东临淄山王村西汉墓从葬坑出土一组规模宏大的出行车马军阵的陶俑群^{〔1〕}，包括陶模型马车9辆、牛车2乘，陶骑兵俑49件、步兵俑255件，还有许多侍卫仆从等陶俑。与军阵陶俑群共同出土的

〔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区文物管理局：《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文物出版社，20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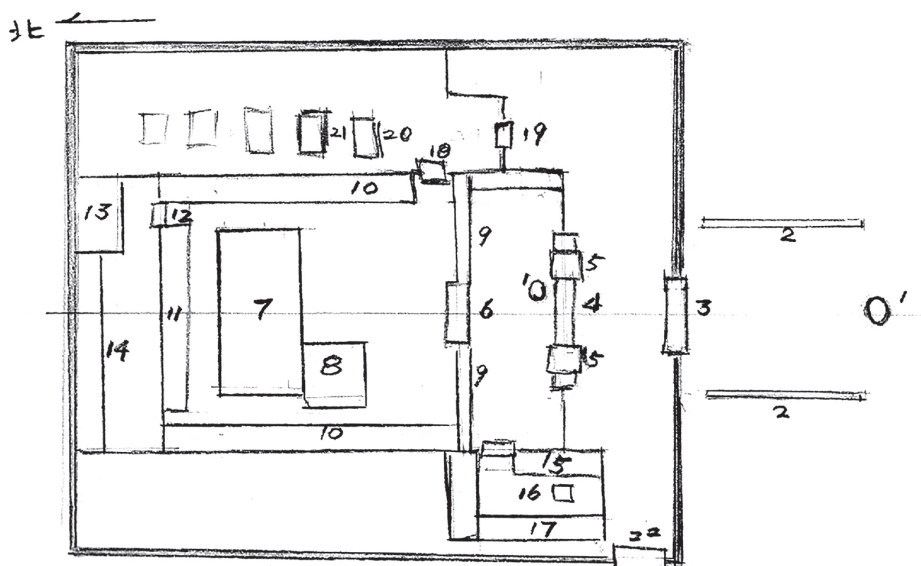
〔图六〕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莫府示意图（杨泓绘）

1. 正厅 2. 庖厨 3. 马厩 4. 门前兵兰 5. 建鼓 榜题：(1) 库 (2) 仓 (3) 营曹 (4) 司马舍 (5) [史] [舍] (6) 宁县东门 (7) 宁城东门 (8) 齐室 (9) 营门 (10) 宁市中 (11) 莫府南门 (12) 宁城南门 (13) 共官门 (14) 东府门 (15) 西门



〔图七〕护乌桓校尉莫府平面想象复原图（杨泓绘）

1. 建鼓 2. 兵兰 3. 宁城南门 4. 莫府正门 5. 东、西门阙 6. 正厅院门 7. 正厅 8. 侧室 9. 前院廊房 10. 正院两侧廊房 11. 齐室 12. 后院门 13. 仓 14. 库 15. 庖厨 16. 井 17. 马厩 18. 莫府东门 19. 营门 20. 司马舍 21. 史舍 22. 西门



〔图八〕山东临淄山王村西汉陶质模型出土情况（正院及后院局部）
采自《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插图图三



考古标本，还有一组陶质建筑模型〔图八〕。在发掘报告的出土器物平面图上，标明了这些建筑模型的位置，可以看出其模拟的是一座坐北朝南、设有两重门、三进院落的大型建筑，由发掘标本YK50至YK61号共计12件陶建筑模型组成。

临淄山王村西汉墓从葬坑中，50、51号是最外门前左、右的一双门阙〔图九〕，形制是二出阙〔图十〕。与和林格尔东汉墓莫府壁画对比，相当于宁城南门的位置（由于该墓没有表示围墙的陶模型，本文复原图的围墙为作者的推想复原）。52号是一座三开间的大门模型〔图十一〕，应是前院门，相当于和林格尔壁画的莫府南门，进入此门就进入了前院。53号也是一座三开间的大门，应是正院门〔图十二〕，相当和林格尔壁画上的正院门。55号是一座下有台基、面阔和进深各三间的殿堂模型〔图十三〕，是这组建筑模型的中心建筑，相当于和林格尔壁画的正厅。54号是侧厅，相当于和林格尔壁画右侧的侧厅。上下三层，顶层四周壁面开窗，顶或为木构，已残缺〔图十五〕。顶层亦可作为家居宴乐的场所。正厅后面是后院，分布着56—59号共四座建筑模型〔图十四〕，应为属吏办公场所，相当于和林格尔壁画中莫府东营房内的属吏办公场所。60号为庖厨〔图十六〕，61号为仓房〔图十七〕，坐落在后院的东北角。后

〔图九〕山王村西汉墓陶阙模型（东阙）
采自《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彩版一三〇



〔图十〕山王村陶阙模型出土情况（东阙）
采自《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页20图四六



〔图十一〕山王村陶前院门模型出土情况
采自《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页11图一六



院的后面还有两个猪圈，庖厨旁畜有供食用的羊群。仓的位置也与和林格尔壁画一致，只是庖厨的位置与和画不同，在和林格尔壁画中，庖厨在前院西侧。

总体来看，这组建筑模型与和林格尔东汉壁画所表现的莫府大致相同。还应注意的是，在这组建筑的门前，也设有与和林格尔壁画相同的建鼓〔图十八〕，还出土有击鼓俑〔图十九〕。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设有行刑的斧质，即标本195、196号〔图二十〕。汉时行刑多腰斩，人犯要解衣裸身伏于质上。《史记·张丞相列传》：“苍坐法当斩，解衣伏质。”^{〔1〕}在斧质模型附近，还出有表现遭行刑腰斩的陶俑（标本160号）。鼓下行刑，一般与军事有关。《后汉书·岑彭传》：“收歆置鼓下，将斩之。”唐李善注：“军将最尊，出执旗鼓，若置营，则立旗以为军门，并设鼓。戮人必于其下。”^{〔2〕}这组建筑模型又与具有相当规模的出行军阵联系在一起，更显示出浓烈的军事色彩。因此可以确定，这组建筑模型应是一座西汉时的

〔1〕 《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页2675，中华书局，1959年。

〔2〕 《后汉书》卷一七《岑彭传》，页654，中华书局，1965年。

〔图十二〕山王村陶正院门模型
 采自《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彩版一三三



〔图十三〕山王村正厅模型出土情况
 采自《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页15图二九



〔图十四〕山王村后院四室模型出土情况
 采自《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页16图三〇



〔图十五〕山王村侧室模型出土情况
 采自《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页15图二七



〔图十六〕山王村庖厨模型出土情况
 采自《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页17图三五



〔图十七〕山王村陶仓模型
 采自《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彩版一三九



〔图十八〕山王村陶建鼓模型

采自《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彩版一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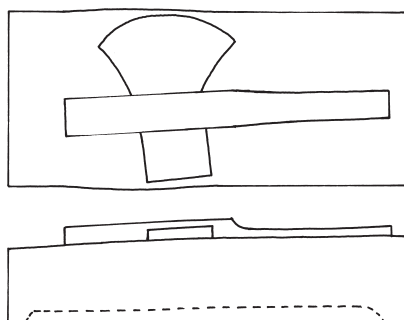
〔图十九〕山王村陶击鼓俑

采自《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彩版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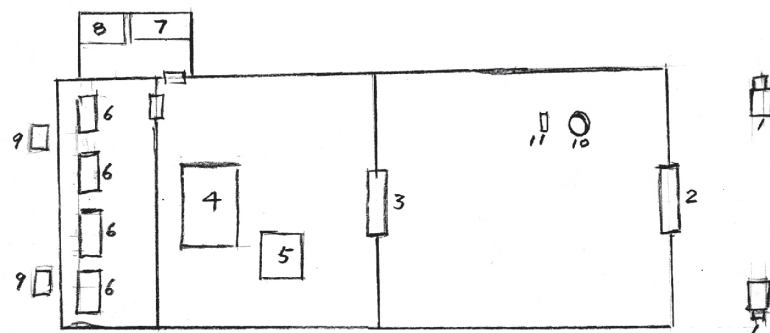
〔图二十〕山王村陶斧质模型线图

采自《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页91图一三一:6



〔图二十一〕山王村西汉墓府平面想象复原图（杨泓绘）

1. 双阙 2. 前院门（莫府大门） 3. 正院门 4. 正厅 5. 侧室 6. 后院四室 7. 仓 8. 庖厨 9. 猪圈 10. 建鼓 11. 斧质



具有三进院落的莫府模型〔图二十一〕，其年代当距李广生活的时期不远。它虽然还不是行军作战时的莫府，但也让今人更具象地了解西汉时莫府建筑的真实形貌，弥足珍贵。

三

通过考古资料对两汉莫府形貌有所了解以后，返回来看《李将军列传》记述中的莫府，我们会发现，大将军卫青的莫府和前将军李广的莫府，是上下两级莫府。

到莫府对簿，李广就要面对莫府内小吏对他率军失期的苛责，乃至拷掠。在汉代，那些小吏常常对

失职获罪的高级将帅一逞官威，极尽污辱拷掠之能事。拥立孝文帝有功的名将周勃，失意后遭吏治，就曾慨叹：“吾尝将百万兵，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其子周亚夫曾平吴楚七国之乱，晚年也因不堪吏责，终至绝食而亡^①。李广此前有因雁门一役失败被俘而被下吏责问的经历，所以这次“不能复对刀笔之吏”，愤而自杀。李广的悲剧，太史公司马迁将责任推给了大将军卫青，怪他让李广与赵食其率军走右道，因而未能如期与大军会合。让李广由前将军改行右道的原因有二：一是出行前汉武帝“以为李广老，数奇”，告诫卫青不让李广阻挡单于；二是因公孙敖新失侯，欲让他在前敌立功，故用公孙敖为中将军，而徙前将军李广。

古人迷信占卜，李广也不例外。久未能因功封侯，李广认为自己命运不济，就去找人算命。他找到望气（“望气”是一种算命术，类似近世之看相）王朔，问他：“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王朔用算命者惯用的手法问李广：“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李广想来想去，想起了一件做错了的事。他说：“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于是王朔得出结论：“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算命的结果传出去，朝野上下皆认为李广“数奇”（命数不好），李广给自己套上了无形的精神枷锁，以致连皇帝都顾忌李广“数奇”，嘱咐大将军卫青，“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这也是造成李广自杀的原因之一。

但是认真分析，李广的悲剧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与汉代统治阶层与解决匈奴问题的战略决策演变有关。李广青壮年时，正当汉文帝至景帝主政时期，对国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不主动对外用兵，对待匈奴的侵扰只是被动防御，只有当匈奴单于举国来犯时，才临时集合大军备胡，匈奴一退，汉亦罢军。对于边防诸郡，靠的是边郡守将各自抗击匈奴的小规模战役。李广正是在边郡抗击匈奴的局部守边战斗中战功卓著，成为匈奴畏惧的“汉之飞将军”。也就是说，李广治军及其个人勇敢，适合较小规模的边境自卫反击战。

据《李将军列传》所记，李广治军“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又言其个人勇敢，“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再看他所面对的匈奴军，‘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②显示出古代游牧民族全民皆兵的特点，这种类型的骑兵就是恩格斯论述骑兵时所称的“非正规骑兵”。而东方非正规骑兵的特点，就是“队形散乱，冲锋时互不协调和没有严整的阵列”^③。按李广治军原则下的骑兵，“行无部伍行陈”，基本上也只能归于“非正规骑兵”之列。故此李广的军队面对远

① 《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页2073、2079，中华书局，1959年。

②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页2879、2892，中华书局，1962年。

③ 恩格斯：《骑兵》，《马克思恩格斯集》第14卷，页298—326，人民出版社，1964年。

道而来抢掠的匈奴军时，常能取胜。除了勇敢以外，还在于抗御匈奴是为了保边卫民，占有道义上的优势，得到边民的拥护和支持。而且反击战并不远离边塞，有后方郡县作为后勤依托。匈奴军远道来侵，旅途疲惫，没有巩固的基地可依托，缺乏后勤供给，食用全靠掠夺，作战目的只为掠夺趋利，并无长久占有汉郡领土的图谋，成则掠夺，败则远遁。因此，养精蓄锐、待敌出击的李广军，常能击退同等数量甚至数量稍超过自己的匈奴军。这就是李广主持边郡军事，大小数十战常胜的原因。但是，李广离开边郡调到汉廷中央任职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前已述及，李广出雁门主动进攻匈奴，遭遇数量远大于所领军队的敌军时，不仅大败，还被敌人生擒。这也说明，在同样条件下，两支非正规骑兵相遇，经常是谁的兵多谁就会获胜，由此暴露出李广治军的弱点。

与李广齐名的边将还有程不识，其治军与李广有很大不同。“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程不识曾说：“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严号令、讲求行伍营陈，是使骑兵正规化的必要途径，如此才能摆脱与匈奴骑兵相似的非正规骑兵的困境。特别是到汉武帝时，由于经过“文景之治”，国内经济发生很大变化，所以有能力主动出击，以解除长期以来匈奴对边郡的袭扰。逐渐开展两支以上的部队，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进而发展到包括几位将军率领的多支部队的大兵团出击，出动军队的总人数从数万到十万以上，甚至更多。这就进一步要求部队正规组训，行伍结阵，严明纪律，讲求配合，协同作战。指挥西汉中央军队走向正规化的代表人物，就是汉武帝委以重任的卫青。西汉军队这样的变化，改变了与匈奴作战的被动态势，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使得结阵严整的汉军正规骑兵，与非正规的乌合趋利的匈奴骑兵作战时，能操胜券。

元光五年(前130年)卫青为车骑将军，与三将军各将万骑，分道出击。其余三将军中，轻车将军公孙贺无功，骑将军公孙敖损失七千骑，骑将军李广本人被匈奴俘虏，得脱归，二将皆当斩，赎为庶人。唯有卫青出上谷，至龙城，斩首虏数百，胜利而归。自元光五年(前130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从车骑将军升任大将军，七次出击匈奴，均有战绩，斩捕首虏五万余级。元狩四年春，卫青统军出塞千里进击，命令赵食其与李广为左翼。当时匈奴单于听信降将赵信的计谋，“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适值大将军军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①虽然汉骑兵数量只有敌人的二分之一，但是以严密的正规骑兵结阵对敌；匈奴虽众，但均为乌合的非正规骑兵。结果汉军大胜，单于只率健骑数百，突出汉军重围，逃向西北。

这使我们想起恩格斯在论述《骑兵》时讲过的话，当分析欧洲国家正规骑兵和非洲非正规骑兵作战的特点时，他引述拿破仑谈到马木留克兵时所言：“2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

①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35，中华书局，1959年。

1500个马木留克兵。”^{〔1〕}大将军卫青统率的经正规组训、纪律严明的西汉骑兵，能够出塞，长途奔袭，连败匈奴，其原因正与恩格斯的论述相契合。

再观李广，自离开特立独行的边郡统军任务，调职到汉廷中央后，他多次参与协同作战，皆无功，从未获封侯，看来并非因他“数奇”，很可能是因为李广治军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又不能很好地与友军配合。元狩二年（前121年）李广以郎中令率军与博望侯张骞配合，出右北平击匈奴，就是因为两军异道进击而缺乏配合，李广先行，导致仅有4千骑兵的李广军遭遇匈奴左贤王4万大军，而张骞军未到，几乎导致李广全军覆没。幸而张骞军赶到，匈奴才退军。过了两年，李广力请从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汉武帝勉强同意，时大将军下属四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当侦知单于所在方位后，大将军自引中军精兵前往，大军前行，极需右翼掩护，故安排多达两个将军的兵力，派遣前将军李广会同右将军赵食其前往（出发前汉武帝就嘱咐卫青，不让安排李广先战单于，卫青遵照皇帝的指示行事，应无过错）。但李广一心想立功封侯，并不想服从军令，为此还与卫青争执，力争不去右翼。大军出行，令行禁止，属将不服从主将指挥，确实是李广的过错。当他赌气出发后，又迷失道路，以致在卫青的中军主力与单于鏖战时，右路两将军迟迟未与大军相会，使大军失去右翼屏障。幸而卫青击败匈奴，单于突围向西北逃走。“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余级，遂至寘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2〕}这时，迷路的右翼两将军仍未能与大军会合。直到大将军“引还过幕南，乃得前将军、右将军”^{〔3〕}。无论道路情况如何，将军应尽量克服困难，依令而行，大军迷路，更是难以原谅的错误。

历史上中外有许多因军队未按时到达而导致战役失败的战例。这又让人想起法国皇帝拿破仑，在著名的滑铁卢战役中，正是由于法军元帅格鲁西的军队失期，使拿破仑在关键时刻消耗了全部后备兵力，因军力不足而导致最终失败^{〔4〕}。因此李广、赵食其军因路难行而迷路失期，绝难原谅，大将军卫青莫府簿责是正确的。李广自杀就逃避了军法的责罚；右将军赵食其当斩，赎为庶人。太史公在《李将军列传》中描述这一事件时，带着个人情感，让人读后感觉李广无过错，是卫青处理不当而造成名将李广自杀的悲剧。但太史公终究还不是不顾历史的真实情况的作者，他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还是如实记录了元狩四年战争的经过，再结合班氏《汉书》中有关的记述，今日还是可以了解大将军卫青率领四将军出定襄击匈奴的过程。

〔1〕 前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320页。

〔2〕 前揭《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35。

〔3〕 前揭《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36。

〔4〕 [英] 吉尔斯·麦克多诺（巩丽娟译）：《世界战役史：还原50个历史大战场》页247—258，金城出版社，2013年。

四

李广自杀，他个人的悲剧已落幕，但是他家族的悲剧还远未终结。

李广有三个儿子，为李当户、李椒和李敢。当户与椒皆先李广死，当户有遗腹子名陵。李敢从李广征战，有勇力。元狩四年(前119年)李广率军击匈奴时，李敢不在大将军卫青军中，而是以校尉身份随从骠骑将军霍去病，击匈奴左贤王。李敢“力战，夺左贤王鼓旗，斩首多，赐爵关内侯。食邑二百户，代广为郎中令。”可以说其父一心企望的立功封侯，他办到了。李敢虽得封侯，却十分短命。战后归朝，李敢一直“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骠骑将军去病与青有亲，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讳云鹿角杀之。”总之，李敢死得不明不白。

最后酿成李氏家族遭人唾弃的悲剧的是李广的孙子李陵，原因是他军败叛汉，投降匈奴，以致“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但是，在汉廷欲因李陵降敌而欲加刑于其妻女时，还是有人出来为李陵辩护，那正是太史公司马迁。以致汉武帝“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①。但是司马迁认为，皇帝并未真正了解他为李陵辩护的本意，在《报任安书》中，他曾作长篇解释：“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②

正是出于司马迁对李陵乃至李氏家族的情感，写《史记》时，在李广传的文字中倾注了浓厚的个人感情，今日读《李将军列传》，读者仍会被太史公的激情所感染。如果将其与班氏所著《汉书》对照，则可看到，写历史另有一种春秋笔法。《汉书》将李广与苏建合列为一传。苏建虽一生事迹也与抗御匈奴有关，但其声望远逊于李广，之所以能与李广名列同传，是依赖于其中子苏武的事迹。

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汉武帝“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苏武在匈奴时，因其副使副中郎将张胜参与了匈奴缑王拟劫持单于归汉，连累苏武遭单于扣压。匈奴单于几次逼武投降，武严词拒绝，并曾想为国自杀，未死。单于“乃徙武北海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武“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在北海期间，李陵曾为匈奴去劝降苏武。“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李陵谈起苏武的哥哥和弟弟都是因故自杀，又说：“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但苏武不为所动，说：“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驩，效死于前。”“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与武诀去。”直到汉昭帝即位后数年，又与匈奴通使，朝廷终于知悉苏武情况，苏武才得归还。“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将“皆有功德，知名当世”的名臣凡十一人，法其形貌，画于麒麟

① 《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页2456，中华书局，1962年。

②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页2729，中华书局，1962年。

阁，苏武即位列其中，榜题为“典属国苏武”^{〔1〕}。班固《汉书》将苏武与李陵共传，对比强烈，以此将叛汉投敌的李陵钉于历史的耻辱柱上。

李陵叛汉降匈奴，使李广家族经三代后名节不保，遂亡其宗。但是匈奴边患未绝，边郡民众一直怀念保边卫汉的飞将军李广，延续至魏晋，千古不衰。后人已记不清李广的真实容貌，就在画像时选用了当时人们心目中最雄健英俊的骑士的形象，前文引述的甘肃敦煌晋墓李广画砖可以为证。这充分说明，为国保民的英雄，民众自会持久怀念。有道是：边民千年长思念，“无功”李广未封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特约编辑：郑 彤)

〔1〕 前揭《李广苏建传》，页2460—2469。